

# 深读



20多名译者耗时10年用中文还原80年前东京审判历史真相

## 那些文字,像弹片嵌骨隐隐作痛
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现场。  
图片来源:国家图书馆东京审判资源库

■ 本报记者 阮帅 王啸天 纪双亚

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八十周年。

4月30日,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·全译本》(以下简称《全译本》)正式出版发行,共40卷2200多万字,首次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,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。

《全译本》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、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编译。“啃”下近5万页、涉及大量法律术语和历史专有名词的英语原始文档,逐字逐句译成中文,20多名译者前赴后继,用了10年时间。

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、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瀚之子向隆万认为,这是揭露侵略真相、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,也能让大众读懂审判细节,汲取历史教训。

举证、反证;反驳、再反驳……法庭的审理与审判过程像“没有硝烟的战斗”,没有浮华场面,只有证据的不断交锋和法理的严谨博弈。
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19位教师承担《全译本》主要翻译任务,他们平均每人花费5至6年时间,用中文准确还原历史真相。

记者对话其中3名译者,他们有的是抗战老兵亲属,有的来自被细菌战荼毒的衢州,听他们讲述译卷背后的故事。

### (一)

“这些文字就像嵌在我身体里的弹片,时时隐痛。我会带着它们勇敢地走下去。”

——张悦,《全译本》第18卷、38卷译者

在张悦看来,当初加入《全译本》翻译团队的决定,带着几分“莽撞”,也因她心里的一股执念。

张悦的外公去世时,家人在他骨灰中发现了7枚弹片。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,晚年饱受病痛折磨,却对深嵌体内的弹片只字未提。

这场离别,让张悦迫切地想要触碰那段被战火浸染的历史真相。

2019年,得知学校正组建《全译本》翻译团队,张悦马上报名参加了试译。试译很顺利,当时31岁的她成了团队里最年轻的译者之一。

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中法庭重点审理的日军战争暴行之一。张悦被分到《全译本》第18卷和第38卷的翻译任务,其中恰有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的辩护总结。

她看到,辩护律师把松井石根描述成“爱好和平的军人”,声称他“成为军人的初衷是相信武器的存在目的是偃武息戈”,甚至堂而皇之地引用《孟子》名句“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,以“在正义的道路上无畏笃行,大将的灵魂将千古不朽”结尾,企图颠倒黑白。

该如何翻译这些话?

作为一个中国人,她对这些带有极强迷惑性和煽动性的话感到恶心,打心底里抗拒与之共情;但从译者的视角看,她不得不承认日本辩护律师的英文极好,且这些雄辩话术包装精美,专业性很强。

如果按中文的阅读习惯,用精心打磨的排比句、对仗工整的成语将其忠实地翻译,会不会真有读者被“带偏”?但如果在译文里掺杂主观情绪,则违背职业操守,更与自己的初心背道而驰。

“这次,我们首先是译者。”百般纠结下,张悦想起老校长的叮嘱。

之前,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校长、资深翻译家、《全译本》翻译团队负责人叶兴国召集老师们开会,给大家定下此次翻译的原则:必须牢记译者身份,忠实于原文,忠实于历史真相。

叶兴国的语气温和而坚定。张悦明白,老校长这是以身作则。他负责翻译的第11卷和第40卷中,有更多对日军残酷暴行的真实记录。论心情,他比自己更煎熬。

最终,张悦工工整整地,将这份“华丽而嚣张”的辩护词原封不动译了出来。

她愿意相信,只有真实呈现辩护律师的嚣张气焰和魅惑话术,才能让中外学者准确把握当年庭审的真实状态,做出有效的研究;只有尊重事实,才能让读者理解当时中国团队举证的艰难和肩负的重压。

今年4月,张悦读到新闻,说日本正谋求恢复二战时的军衔称谓。

这些军衔称谓,张悦再熟悉不过,翻译的过程中,她曾对此进行了大量考证,并对原始文档中的纰漏逐一标注——是“大将”而非“上将”,是“大佐”而非“上校”,对这些军衔称谓的准确译注,为的是还原侵略者接受审判时的真实面貌。

那些本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称谓,如今却要被视为“荣誉”重新拾起,“真的很讽刺”。

不过,张悦因此更加坚信,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。“为死者言,为生者权。”她用这句来自法医界的名言形容这段翻译经历。

4月30日,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瀚之子向隆万在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·全译本》出版发行首发暨学术座谈会上发言。

新华社发


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国法官合影,梅汝璈为前排右二(资料照片)。 新华社发



许传音在证人席上。 图片来源:国家图书馆东京审判资源库



向哲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发言。 图片来源:国家图书馆东京审判资源库

### (二)

“通过翻译,我对故乡过往的遭遇有了切肤痛感,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。”

——张玉宏,《全译本》第22卷、31卷译者

张玉宏的家乡在衢州,她家曾开过一家影楼,距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不过百来米。

“之前听说过救助美国人的故事。”对家乡的过去,张玉宏只有一些零碎的线索。当时年少的她想不到,自己将来会以一名译者的身份,再度走进故乡的记忆。

二战期间,美国曾发起空袭日本本土的杜立特行动,但由于油料耗尽、联络不畅,原计划完成任务后在衢州机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,大多在返航途中弃机跳伞,散落在浙江、江西等地,其中64人被中国军民援救。

张玉宏负责翻译的文档中,就有法庭再审“杜立特飞行员”一案,对8名被日军俘虏的飞行员所遭受的残忍虐待和非法审判、处决进行审判。

她也看到,辩护证据中一开始称杜立特飞行员为“criminal”(罪犯、犯人),而后改成“prisoner”(俘虏、囚犯)。用词的变化,证明了对杜立特行动性质认定的改变,“正义的审判不会迟到。”

“我不是复仇主义者,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我相信,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”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,在庭审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,张玉宏印象很深。

在翻译的过程中,张玉宏和团队成员、学院师生接力编制出1500多万字的语料库,并应用在日常教学中。如今,张玉宏作为学校英语学院副院长,正带领团队依托《全译本》研究成果,积极申报和筹备涉外法治相关新专业,计划培养兼具外语能力与法学素养的专业人才。

“教翻译技能,也讲故事和历史。”张玉宏说,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通过《全译本》,汲取历史教训,珍惜和平生活。



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·全译本》。

### (三)

“参与翻译的5年好像漫长的黑夜。但我相信无论多么寂寞难熬的长夜,都终会迎来曙光。”

——杨爱军,《全译本》第21卷、36卷译者

杨爱军的翻译工作几乎都在晚上进行。

从吃完晚饭一直到深夜,每天翻译近4个小时,为了不打扰妻女休息,他在书房支起一张床,忙完就在房间里过夜。

大部分时间,杨爱军不得不直面各种暴行记录。

如第21卷的内容涉及泰缅铁路相关庭审实录,其中有控方举证、检察官当庭出示罪证,也有受害者出庭作证。

这条“死亡铁路”,是二战中日本野蛮侵略罪行的见证,平均每修筑1公里,就有数百人付出宝贵的生命。

杨爱军在记录中看到,被日军强征的平民、盟军俘虏高强度劳作,他们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,哪怕身患重病也被强行驱赶上工,人们因过度疲劳、营养不良、虐待或传染病,在去往工地的路上、劳作途中倒下。

悲惨的细节在记录中比比皆是。杨爱军还承担第33卷的校订工作。该卷近600页,涉及1937年至1945年日本在华暴行的证据概略,包括大量大屠杀和谋杀、酷刑、强奸、掠夺和肆意破坏财产的案列,内容令人发指。

“这卷看得最难受。”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,但当看到证人的描述,看到一个一个记忆碎片拼凑起来的人间炼狱般的场景,杨爱军还是动容了。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下,“生命竟能脆弱、卑微到这种程度。”

他看到,南京市孙永成陈述,中国百姓被告知到南京火车站附近的日本军营领取通行证……在集结了大约1万人之后,携带机枪的卡车出现并向人群开火。射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,之后,尸体被扔进江里。

“在一条主街道上,我甚至开始尝试数街道两边的尸体数量,我开始数到500多,然后我发现数是没有用的,因为

我永远也数不完……”这是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官员许传音的证词,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多重身份救助中国同胞。

南京大学副校长、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M.S.贝茨博士在作证日军对南京城妇女的暴行时说:“在南京神学院内,就在我一位朋友的眼皮下,一名中国妇女被17名日本士兵快速轮奸,我不愿再述偶尔发生的不正常的暴虐行为,但我确实要提一提,仅在大学校园内,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她76岁的祖母都被强奸。”

……

这只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残酷暴行的冰山一角。

仅仅是阅读,这些记录已令人感到极度不适,何况要逐字逐句将其还原。

“实在受不了的时候,我就出门去散散步。”当翻译工作难以继续时,杨爱军总会到附近的迪荡湖公园,迎着湖畔的晚风散步、夜跑,通过运动发泄情绪,以求短暂的平静。

有时,杨爱军也在证人身上寻求慰藉——亲身经历过那样的绝望,他们仍毅然站了出来,在法庭上勇敢发声,直面血泪。

比如,许传音以流利英语回答检察官的提问,证词逻辑严密、条理清晰,内容详实而精确,这对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的罪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

完成最后一页翻译工作的那天晚上,杨爱军彻夜无眠。第二天,他难得比妻子更早打开房门,兴奋地和她分享。

顺利完成使命,杨爱军得以暂时卸下负担,回归家庭。那天,家人们为他准备了一桌小小的庆功宴,餐桌上,有他最爱的油煎小黄鱼。

简单而朴实的幸福感,就像打破长夜

### 记者手记

## 这段血泪记忆,必须用我们的语言准确书写

■ 阮帅

我们为什么需要《全译本》?

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、受害最深的国家,对日本侵华侵略犯罪的认定,是整个东京审判的重中之重。“庭审记录中有大量扎实的证据,这是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全面审视。”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、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瀚之子向隆万如是说。

这段血泪记忆,必须用我们的语言准确书写。

然而,在《全译本》之前,世人仅能通过英、日两种文本的档案资料来了解这段历史,而对浩繁的外语文献,不仅中国学者查考困难,普通大众更难以触及。

另外,在原始文档中,还有不少拼写错误、地名讹误等情况,如有证人重复出现时,前后文中记录的名字竟然不同,这些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查验和考据。
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院长、资深翻译家、《全译本》翻译团队负责人叶兴国介绍,为确保《全译本》的学术权威性,

前后共有百余人参与翻译、审校和编辑。通过多语种比对、跨学科合作,《全译本》考据严谨、校勘精细,准确性超越英、日文庭审记录原始文档。不仅如此,每卷包括人名、地名、事件、机构、文献及其他重要名词,都进行了详细审校和索引编纂,便于读者查询、检索。

“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,严惩了军国主义头目,伸张了国际正义,对构建战后国际秩序意义深远。”叶兴国说,《全译本》的出版是维护东京审判历史价值的有力举措,并扩大了东京审判核心文献的读者群体,是抗战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。

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慧认为,《全译本》不仅还原了东京审判真相、补充二战历史史料,更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权威研究文本,这有助于中国学界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构建自主话语体系。

